

要论说历史上的海归，就要讲到中国百年留学史。但是，与一般研究留学史的论者稍有不同，我在本章的论说中不会过于关注历史细节，而仅对中国留学史和海归史作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宏观的回顾。

提起历史上的海归，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容闳。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容闳（1828～1912年）的地位非同寻常：他是最早的留学生，又是最早的留学事件——留美幼童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容闳的贡献早已得到公认。笔者也深深敬佩他异常的才华和毅力，并为他非凡的经历和勇气所打动。不过，本书想从另一个未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来评价这位杰出的先驱。我想更为强调他因缺乏中国文化素养而带来的先天不足，这种不足使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是导致120名留美幼童被提早撤回的重要原因。

容闳的西学经历

容闳生于广东珠海（当时属于香山县）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母在供了他的长兄读私塾后，已无力再供他上学。但是，在离容闳家很近的澳门，有西方传教士开设的学校，它们不仅不收中国学生的学

费，而且还免费供应食宿。当时的中国父母，尤其是那些体面的家庭，并不乐意送孩子进西校读书，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的眼里，读西校的学生出路不好。容闳家贫，所以不得已在 1835 年入读澳门的西校。后来，该校停办，容闳辍学了。到了 1841 年，他又进了澳门另一间西校——马礼逊学校读书。次年，该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往。在那里，他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西式中小学教育，一直到他留学美国。

1847 年，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勃朗因病要回美国治疗。他在课堂上说，愿意跟他去美国读书的学生请站起来。结果，只有三个同学站起来，首位是容闳，其他两位是黄胜、黄宽。于是，容闳得到数名西方人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他先读中学（孟松学校），然后进耶鲁大学，于 1854 年毕业，成为第一位毕业于西方大学的中国人。

容闳在留美之前，他在中国起码已接受了七八年西方教育；留美以后，他又接受了七年更完整的大学教育。吴义雄认为，容闳留美前所上的马礼逊学校是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的，容闳“学中文的时间，前后有 8 到 9 年，不可谓短”。但是，吴也承认，西式学校对中文可能不太重视，虽然中文教育在马礼逊学校占有一席之地，但该校的重点是英文教育（《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广东社会科学》1999 年版第 3 期）。无论如何，马礼逊学校毕竟是西方人所办的西式学校，中国传统教育极其有限，说容闳在出国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式教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容闳在留美期间加入美籍，成为美国公民。但是，这位在中国出生的黄皮肤青年却始终没有忘却故乡，他居美七年，对母国之爱一直未曾衰减。1855年，他带着“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愿回国。容闳指出：“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西学东渐》，《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页）

这样看来，他的心似乎没有完全西化。但是，除了这种宏愿和对母国的爱以外，他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处事态度、行为模式，甚至连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等，又有多少中国的成分呢？

“香蕉仔”容闳

可以说，容闳这位最早的海归，同时也可算是最早的“香蕉仔”。“香蕉仔”是广东移民形容自小生长在美加的华人后裔的叫法。香蕉皮是黄色的，里面的果肉却是白色的；“香蕉仔”也同样如此：他们有黄色皮肤，外表看起来像东方人，但内心——语言、思维却是白人的、西化的。北美华人以该词形象地形容那些在西方土生土长，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有中国人之表而无中国人之心的孩子，认为他们只懂西方文化而基本上不懂中国文化。笔者以为，用该词来描述容闳也是完全适合的，至少是在所受教育、文化学养的层面，说他从小便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仔”，实不为过。

可能会有论者不同意容闳是“香蕉仔”的说法。毕竟容闳出生于中国，并且在他 1847 年留美之前已在中国生活了 19 年。

例如，章开沅先生就强调容闳不仅在西学东渐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他在中学西渐方面也做了不容忽视的工作。章先生说：“我们不宜把青年容闳看成一张可供任意涂抹西方油画的白纸，实际上他已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浙江社会科学》1999 年第 1 期）章先生查阅过耶鲁大学馆藏容闳档案，发现容闳“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歌有所了解，而且还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 1854 级众多美国学友赠别。”（《对容闳的新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这些名言佳句包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礼之用，和为贵”，“有志者，事竟成”等。章先生发现的这些材料，对我们全面认识容闳很有帮助。这些材料表明：容闳确实不是完全不懂中学。

但是，章开沅先生可能夸大了容闳的中学素养。仅仅通过遗传，他身上能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吗？他所上的马礼逊学校尽管有中文教育，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这方面的教育不会占很重要的比例。他出生于贫穷的农家，他在家里最多只能接受世俗文化，而难以接触到精英文化。容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教育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很高的中学素养。上述章开沅先生所列的证据似乎不足以从根本上否定容闳总体上是一个“香蕉人”的说法。

另一位研究者李喜所对容闳的中学素养的评价似

乎较为客观，但事实上还是高估了这种素养。他说：“实事求是地讲，说容闳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未免过誉；说容闳中国文化水平很低，也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容闳具备中国文化的基本素养，中美文化兼通，他的中文水平服务于其中美文化沟通事业绰绰有余。”（《容闳与中美文化沟通》，《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但是请问，没有接受过正规中国传统教育的容闳，他的中国文化水平能有多高呢？

孤独的先行者

当容闳重返中国时，他对故乡的第一印象是：母国反倒像异乡。此时，他“为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故赶紧补习国语。但是，他又不能请中国老师来教，因为他们不懂英语。要教这位长期在英语环境中成长的“香蕉仔”，必须用英语来讲解中文。在这种情况下，容闳只好请教既懂英文又懂中文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中国人学中文，还得由外国人来教，这好像很滑稽，但确实就是这么荒诞。而且，跟传教士学来的中文，很难是原汁原味的，但是容闳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请他们来教。

尽管容闳后来慢慢能讲汉语了，但他似乎终生都未能用汉语写作，以至于后来要在中国官场写各种公文时，不得不找人“操刀”。所以李鸿章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识大体，亦是一病。”（《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影印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本，第18页）

面对这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仔”，中国人一开始也不太把他当作自己人，而总是视为外国人。因此，心怀宏愿回国的容闳，内心异常苦闷。他是为了中国而回来的，但中国似乎并不欢迎他。从小就接受西式教育的容闳，自己要当回中国人和让周围的人把他看成中国人，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作为一个在心灵里精神上基本上西化了的美籍华人，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容闳确实太独特了。他是一位孤独的先行者！

独一无二的边缘人

在当时的中国，容闳是独一无二的。他在那时比其他任何中国人都更能深入西学的核心，这是他的幸运；但是，不谙中学，这又是他的不幸。对容闳因缺乏中学素养而带来的局限性，有些论者已有所见。

例如，罗福惠称容闳为“边际人”，他指出：“具体到容闳其人，他作为边际人的第一层意思是对祖国固有文化已相当隔膜……可以说，容闳对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实在未稍窥堂奥，所以他既不能认识固有文化优在何处、劣在何处，更不能设想中国人当如何对待、处置固有文化。崇仰西学或与他经历类似的人称其学识优长，但稍为守旧者则视其不谙中学为一病。客观地说，不能兼通中西文化确实难有作为，尤其难对改造固有文化和建设新文化作出大的贡献。”（《“边缘人”的角色尴尬——容闳在晚清社会中的人生境遇》，《学术论坛》2000年第

3 期。)

与罗福惠、李细珠称容闳为“边际人”相似，石霓称容闳为“边缘人”（《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该书第二章标题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一个孤独的边缘人”）无论是“边际人”，还是“边缘人”，均意味着他在中、美两国都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更难以进入权力中心。他在两边都难以发挥影响，并且似乎还意味着他在文化取向上两头都不够深入。

本书称他为“香蕉仔”，主要强调他在中、西文化上的不均衡——西强中弱，西方文化确实已深深地扎根于容闳的内心。他除了留美 7 年以外，后来又在美国生活了 30 多年。虽然他生活于西方社会的边缘，但是，在容闳的内心，西方文化并不边缘，相反，中国文化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却真的属于边缘地带。“边际人”或“边缘人”的概念用于描述现实生活中的容闳，是合适的，但用于描述精神生活中的容闳，似乎并不那么合适。

容闳回国经过 8 年不如意的遭遇以后，到了 1863 年，其命运终于发生了转变。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被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用以建立西式工厂，是为后来的江南制造局。尔后，对容闳命运有更大影响的事是：曾国藩接受了他关于派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建议并上奏朝廷，很快获得了批准。

120 名留美幼童

容闳设计的留学方案是这样的：选拔年龄在 12 岁至 14 岁的学童赴美国留学，学习年限为 15 年。在试行期内先送 120 名，每年 30 人，4 年送完；以后，若第一第二批学生留洋成绩显著，则“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22 页）这个方案基本上被朝廷允准，但将开始留学的年龄改为 12 岁至 16 岁。

容闳与留美幼童

1872 年，首批 30 名幼童赴美留学。此后几年，每年都有同样数量的幼童送到美国，一直至 1875 年止。在这 120 人中，广东人 84 名，占了 70%，其中，香山（今天的中山）人又占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广东在出国留洋方面确实得全国风气之先，地位非同寻常。

容闳和另外的官员（先是陈兰彬，后是区愕良，再后是吴子登）去美国作为这些学童的“监督”。他为这些孩子的教育奔波劳累，费尽心思。促成并带领 120 名幼童留美，确实是他对中国的一大贡献。

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教育的容闳，回国后一直都有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教育的强烈愿望。回顾

一百多年来留学潮和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杰出的先驱者的眼光。

从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汹涌澎湃的留学潮中，无数中国学子都在沿着这位先驱的足迹往前走。正如以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闻名的舒新城所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在近代中国，作为最早毕业于国外大学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发起、组织最早留学事业的第一人，容闳这位不太会用汉字写作而又深深地热爱母国故土的留学生之父，值得中国人永远怀念和尊敬。

首批派出的小留学生中，绝大部分不负众望，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勤奋学习，汲取全新的西学知识，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在总共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概有一半人已上大学，其中，耶鲁大学22名：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麻省理工学院7名：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5名：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哥伦比亚大学3名：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哈佛大学1名：丁崇吉。正是这些人，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

先驱。

但是，令容闳和其他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百多个小留学生被朝廷在 1881 年提前撤回。这对他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他一生所遭到的最大挫折。为什么会被撤回呢？对此，很多论者都作过探讨。

撤学的因由

从外部的原因看，当时美国掀起排斥华工的浪潮，并且容闳让部分学生进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的请求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这促使国内的一些人坚持以撤回留学生作为对美方的报复。

而内部的原因则非常复杂。一般学者大都认为，顽固派的力量太强大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们一开始就极力反对幼童出国留学，既已成行后，又以个别学生出入教堂、剪掉辫子、沾染不良习惯等为由，不断奏请朝廷撤回。另外，容闳和陈、区、吴这几名朝廷派去的官员的不和，也是不容忽视的内部原因。后三人在作“监督”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而容闳是接受了十多年西方教育却从未接受过正规中国教育的“香蕉人”。因此，他和这三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处事态度等方面的冲突，难以避免。这些冲突，正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直接反映。

李喜所等指出：“留美幼童的撤回有许多偶然因素，如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的私人矛盾，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中学和西学在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价值

观念上发生冲突之后，统治者运用手中权力捍卫封建传统文化，抵制资产阶级文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本能的抵制作作用，它不允许用美国文化去‘化’中国的下一代。”（《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47页）这种说法部分是对的，部分则很有问题。

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等的“私人矛盾”，正体现了中学和西学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偶然因素”。而且，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把西方文化等同于“资本主义文化”，这是不尽科学准确的划分。最近二三十年研究留美幼童事件的国内学者，一般都忽视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高度相关性。其实，不仅中国传统文化不允许西方文化去“化”中国的下一代，在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人也是不接受这种“化”的。

新的观察视角

关注留美幼童事件的学者，大都同情容闳，责备各种各样的顽固派，认为此事的天折是顽固派的过错。尽管笔者也同情容闳，但我却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加以反思。

拙意以为，顽固派固然要受到谴责，但是，容闳的留学设计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有几大先天的不足促使该计划最终失败。

第一，留学生出国时的年龄太小。容闳原计划在

12岁至14岁的孩子中选拔留学生，后来朝廷把年龄上限放宽到16岁。到最后，由于报名不踊跃，容闳又把年龄下限降至10岁。于是，这些中国学生是在中学功底甚浅，甚至是几乎没有中学功底的情况下出国的。

第二，留学年限15年，时间太长了。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留学史，除这些留美幼童以外，似乎还没有谁准备留学那么长时间的。如此长的留学时间，经济上肯定不划算。

第三，没有认真考虑是要把这些留学生培养成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的问题。这一点是非常要害的。对此，不仅中国的统治者有忧虑，被统治者也同样会有忧虑，全体中国人都会有忧虑。

作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自己是在19岁时去美国的，并且他也只留了7年学，但为什么为这些后来者设计那么小的留学年龄和那么长的留学时间呢？也许因为他早期在中国所受的也是西方教育，所以他也希望这些孩子接受全套的西式教育。但正因为如此，他自己就变成了“香蕉人”。

也许，他觉得，岁数越小，孩子们出国后越容易适应；时间越长，他们越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好。但是，容闳为什么不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他到底是要派这些孩子去留学呢，还是要送他们去移民？

作为“香蕉人”鼻祖，容闳在中国办事以及在美国为中国办事时多次碰壁，这跟他不熟悉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些学童留洋 15 年以后，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因不熟悉国情，不懂得中国文化而水土不服？

设想一下：假如这一百多个中国孩子不提早撤回，而是按计划在美国留学 15 年，他们肯定会成为跟容闳一样的“香蕉仔”。于是，“香蕉仔”前辈不断培养“香蕉仔”接班人，这种恶性循环当然难以被国人所认同。

所以，在留美学童刚撤回之时，有人评论道：

夫以中国幼年子弟送往外洋，遂自变且初服，是直为外国增丁口之数而于中国无补，又焉用之？且学徒自幼出洋在外国成四五年成七八年成十出年，少年性情最易变易，即使安分学习别无劣迹，而回华之后，言笑动作皆与外国人无异，甚至并其家世而忘之。殷有父母俱无，无人管束，则更无所顾忌。问以中国之所谓孝悌忠信礼仪廉耻，皆惛惛然，一无所知，反成自恃精于西学，曾经沧海，视天下皆蔑如睥睨，一切旁若无人，此者往往而有。然则中朝不惜经费送之

出洋，以望其成材者，反因此而无所取材，其有不貽旁观之窃笑者乎！[1881年9月29日（光绪辛巳闰七月二十九日）《申报》第3015号，转引自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第1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这样的评论，尽管有些夸张，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批评仅仅看作反面材料的话，是否太简单了呢？

对于坚持要撤回留美学童的顽固派，我们除了谴责之外，是不是也应该看到，他们担心这些小留学生越来越美国化，越来越“去中国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呢？很多论者对顽固派的评价是不是也过于简单化了呢？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者，已经习惯于将中国文化称之为“封建主义文化”，把西方文化称之为“资本主义文化”。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文化优于封建主义文化。按照这种思路，容闳没有接受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教育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他身上没有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沉重包袱，可以接受原汁原味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

上述的思路没有看到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高度相关性，对中国文化作了过于简单的理解。顺着这种思

路，全盘西化就会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论者又都是极力反对全盘西化的。既然全盘西化不可行，那就说明这种思路肯定有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容闳一直生活在“原汁原味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话，他缺乏中学素养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容闳是海归，又很热爱家乡，学成后要想将文明输入母国，那么，他缺乏中学素养就是一个大问题。

作为容闳的后继者，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也沿着先辈的脚印走出了国门。留洋几年之后，更深刻地感到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高度相关性，感到中国留学生若是只通西方的一头所会带来问题。

如果我们把容闳和另一个更出名的留学生严复相比，更容易感受到“香蕉人”的不足。

严复是在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前一年（1853年）出生的，他出洋留学比容闳晚了二十多年。跟容闳留美不同，严复留英。然而两人最大的差别在于：严复在出国留学之前接受了多年的、系统的中式教育，从而有深厚的中学功底，容闳却不然。严复学成回国后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哲学等方面的经典，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人”，成为近代伟大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能用非常典雅的中国文言文来翻译西方经典，这大大缩小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使西学更容易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

严复是由福建船政局送出去留学的。从1875年到1886年，该局派了80名学生前往欧洲留学。他们

都能按计划完成学业，如期归国，没有中途撤回之事发生。跟容闳发动的不如愿的幼童留学相比，这次福建船政局发起的留学活动是成功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留学生年龄较大，他们出国时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多岁。如果说，留美幼童大多数属于小留学生，那么，现在留欧的则是名副其实的大留学生，他们身心均已成熟。

第二，他们在出国前已有较好的中国文化的根底，不会被人担心因留洋而完全西化，成为“香蕉仔”。

第三，他们在国内已有了较好的外语基础，不像留美幼童那样到了国外再花大量的时间学外语。

第四，留学年限较短，一般为3年，个别为6年。这比容闳设计的留学年限合适得多了。

福建船政局设计的欧洲留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容闳设计的美国留学计划的不足。如果说容闳的留美计划非常大胆，风险度很高，福建船政局的留欧计划则要平稳得多。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留欧海军学生的派遣和管理，可反映出清政府和洋务官僚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派遣留美幼童的经验，其留欧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不仅留学见效快，而且还可以避免学生‘西化’。因而，留欧学生与留美幼童相比，不仅年龄大，留学时间短，专业针对性强，而且其‘西化’程度也轻，没有落下‘有害于社会’和‘无益于国家’等罪名。”（石霓：《观念与悲剧一晚清留美幼童

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虽然容闳也很杰出，可是相比之下，他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影响远不如严复。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假如容闳不是一个“香蕉人”，而有严复一样的中学功底，跟严复一样谙熟中国文化，那么，中国“西学第一人”的桂冠就有可能落到容闳的头上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容闳有好的中学功底，他定会为沟通中西文化，加速中国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留学史，不难看到：大多数成功的留学生都不是只通西学，而是中西兼通的。在这方面，不仅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如此，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也比比皆是。

就学贯中西而言，过去百年留学潮中，从20世纪初到中期的第二潮（留学欧美潮）的海归是最为成功的。社会科学界、文学界的大师级人马，如陈寅恪、钱钟书等自不必说，就连华人中最早取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也反复强调，他是两种文化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儿。

杰出的留美幼童

虽然容闳派出的这一百多名留美学生被提前撤回，但是，他们大部分都能够成才。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业、教育、外交、军事、海关等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铭记着这些最早的海归及其功勋。

詹天佑（1861～1919年），中国铁路第一人。

1905年，清政府派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由此开启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历史。他还主持或参与修建了关外、新易、粤汉、汉粤川等铁路，为我国铁路网的规划，线路的勘探、设计、施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炎黄子孙自强不息的精神。今天，“詹天佑奖”已成为中国土木工程项目的最高奖项。

唐绍仪（1860～1938年），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1904年，清朝政府任命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跟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维护国家主权，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设法避免我国权益之损失，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唐绍仪还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

梁敦彦（1857～1924年），清末外交部长。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曾任外务部右侍郎、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等职。梁敦彦还是欧美同学会的首任会长。

梁如浩（1863～1941年），清末民初外交家，曾任外务部右丞。辛亥革命后，出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1年任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

1922 年任接受威海卫委员会委员长。

梁诚（1863 ~ 1917 年），驻美公使。他的外交贡献也非常出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任驻美公使期间，运用外交手腕，在促成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给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了这笔钱，才有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的建立，才有众多的中国人留学美国和欧洲，从而引发百年留学第二潮。

蔡绍基（1859 年 ~ ?），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的校长。他是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人之一，先任督办，后任总办。今天的天津大学校友不会忘记他们学校的创办人。同样是留美幼童出身的梁敦彦和梁如浩也是该校的创办人。

唐国安（1858 ~ 1913 年），清华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 1912 年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第一任校长，大胆改变学制课程，使清华学校实际具备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育职能，并解决了学校的经费和土地问题。

这一百多位小留学生确实了不起。他们中还有中国电报业的鼻祖，如周万鹏，曾任中国电政总局局长，朱宝奎，曾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有中国采矿业的先驱，如吴仰曾被尊为中国机器采矿开山祖；有中国近代海军的出色人才。留美学童中有很多人被分配去海军系统，他们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海军军官，有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义士，如杨兆楠、邝咏钟、黄季良、薛有福在中法战争中阵

亡，沈寿昌、陈金揆、黄祖莲在甲午海战中牺牲。

一百多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任职外交机构者最多（20 人左右），从业海军者次之（接近 20 人），从事电报业者再次之（也有近 20 人），其他大多从事铁路、采矿等行业。

这一百多个中国最早的海归以及他们共同的老师容闳，值得中国人永远怀念！

四次留学浪潮

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清朝当局派出 120 名幼童留学美国、福建船政学堂送出 80 名学生留学欧洲之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留学潮——留日潮。接着依次出现留欧美潮、留苏潮、留世界多国潮。四潮之激荡，构成了百年留学史和百年海归史。

第一波：留日潮

1895 年甲午海战，中华大帝国败给一直被国人瞧不起的东洋小国，这是一件令国人空前心碎的大事，也是刺激中国人不得不发奋的事件。当时不少人认为，日本这个小国之所以那么厉害，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比中国更广泛、更深入地吸收了西学。于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便“以敌为师”，到这

个成功地输入了西洋文明的国度去学习。甚至还出现了一家三代人一同留日的罕见场面，完全可以用“不分男女老少”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据估计，仅19世纪最后几年到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总数大概不会少于3万人。

一位亲身感受过中国留日大潮的日本学者作过这样的描述：

学子相互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青柳笃恒：《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7页。）

留日潮持续了多年，在20世纪初年达到最高峰，至30年代日本侵华而终结。促成此潮的原因多种多样，除了前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外，清政府大力提倡和鼓励留学的政策，日本为缓和中日的对立而积极吸收中国留学生，日本在地理文化上最接近中国等等，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01年，清政府规定：留学生回国，可以赏进士或举人身份。1903年，清政府颁发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言：在日本普通中等学堂毕业并取得优等文凭者为秀才；在日本高等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者为举人；在日本大学堂毕业者为进士。

留日学生最热衷学习的三大领域是法政、军事和教育，而学科学和工程者较少。与此相应，此波中的海归在政界和军界出了不少重要人物，而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则甚小。如政界的陈天华、邹容、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胡汉民、廖仲恺等，军界的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许崇智、蔡锷等都曾留学日本。留日潮对现代中国政治与军事影响之大，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国、共两党的多位重量级人物，都是此潮中的留学生。而且，辛亥革命也与留日潮有很大的关系。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其早期会员中有许多留日学生，著名如邹容、秋瑾、陈天华等。邹容所写的《革命军》等名著，为辛亥革命作舆论准备，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另外，留日潮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明显：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著名的文学家均为此潮中的海归。他们对中国的新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留日学生还对现代汉语产生影响：现代汉语中频繁使用的很多词，如银行、律师、压力、卫生、文凭、派出所、代表、干部、革命等等，最早来自日本人对西文的翻译，它们大多通过留日海归带回中国。

完全可以这样说，20 世纪头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打上了留日海归的印记。遥想过去大唐盛世之时，日本曾大量派遣学生来中国留学，到了 20 世纪却倒过来，更多的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历史之沧桑，令人感慨万千！

西方汉学家曾这样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留

学潮：“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在规模和影响深度方面，中国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394页）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说法，说话者尚未见到或者说并未完全见到后来二十多年汹涌澎湃的中国第四次留学潮，而此潮的留学生数量要比当年留日学生多好多倍。因此，该书再版时应该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修订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而至今尚未终结的中国留学大潮。不过，留日潮学生的数量比后面第二潮、第三潮都要多得多，第一潮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影响，也比后面两潮都大。我们要对第四潮作出历史评价，现在为时尚早，与之相比，对第一潮的评价则已经有定论了。

当然，留学第一潮的不足之处也是有目共睹的。最突出的是：留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能进日本大学读书者少之又少，大部分只能在中等学校或语言学校学习，而以留日名义往日本但实际上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者也大有人在。有当事人这样评论当时的留日学生：“能知自爱者，难得二十分之一。”尽管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不认真读书而整天游玩者确实占了很大的比例。当时的情形是：只要有钱而想去日本留学，谁都可以去。在这种情况下，鱼龙混杂自然难免。

正如有论者指出：“当时许多人来日本根本不读

书，许多的学生并没有真正进入留学状态，而只是实际上的留学游民……如果没有革命，留学生中的浮躁和混乱更为直接。革命给了那些‘赋闲’学生一种共同可以做的事，共同奋斗的目标。各种各样的活动同时也为大量的留学游民提供了最好的节目。”（王政挺：《留学备忘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因此，留日学生尽管数量巨大，质量上却很不如意，数量和质量的反差之大，令人印象深刻。在1906年清廷学部举办的毕业留学生考试中，占考生绝大多数的留日学生与最优者无缘，而前五名都是留美学生。

第二波：留欧美潮

百年留学潮的第二波是留欧美潮，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到40年代。此波的时间与第一波略有交叉。在20世纪的头几年，当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涌向日本学习法政、军事、教育等的同时，已有个别中国人去欧美学农、工、矿等实业学科。再过几年，随着庚子赔款到位，留学欧美的人越来越多，学习领域也越来越广，理、工、农、医、文、法、商等科皆有人学，于是掀起了另一波留学潮。美国和其他国家退还的庚子赔款，被指定用于教育，主要是留学教育。这部分钱就成了第二波留学潮最基本的经济来源。当然，还有学生通过各级政府的资助、实业团体和实业家的资助、私人资助等去欧美留学。

把第二潮与第一潮相比，可以看到两者有很大的

差异：

第一潮的学生集中一国；第二潮的学生则往多国，除美国外，还有去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

第一潮自费生多而公费生少；第二潮则公费生多自费生少。

第一潮选派机制不严，谁有钱谁都可以去；第二潮有严格的选拔机制，学生通过竞争和考试才能去。

第一潮的学生鱼龙混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第二潮的学生综合素质普遍较好，有些还非常好。

第一潮学生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者少之又少；第二潮学生大部分在欧美接受高等教育（留法勤工俭学者除外），在研究院毕业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者占了较高的比例。

第一潮以数量大而引人注目；第二潮以质量高而让人铭记。

第一潮学生老、中、青皆有；第二潮学生基本上是青年。

第一潮学生对中国科学的贡献不大；第二潮学生对此贡献特别大。

.....

我认为，第二潮中的海归是四次浪潮中最成功的、最出色的。中国现代学科的奠基人多为此潮中的海归，如胡明复、姜立夫、熊庆来之于数学；何育杰、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之于物理学；邱宗岳、杨光弼、侯德榜之于化学；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之于地质学；竺可桢之于气象学；张锡钧之于生理

学；茅以升之于桥梁工程学；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之于社会学；马寅初、陈岱荪之于经济学；胡适之、冯友兰、金岳霖之于哲学；陈寅恪之于史学；朱光潜之于美学……这些海归们对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贡献，永远不会被人忘记。中国千千万万学子和普通大众，均受惠于这些大师。

在1948年选出的81名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77名有过留学经历，其中，第二潮海归72名，占了压倒性多数。上述中国现代学科的奠基人多数当选为该届院士。

第二潮留学时间跨度很大，此潮中的海归回国时间的跨度也很大：最早的在20世纪初回来，最晚在50年代初回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大批留学生回国，这无疑是百年海归史上的亮点之一。对此，人们已说得很多。必须注意的是：他们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出去留学的，而在出去之前，他们都在本土接受了良好的中高等教育。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在人们对当今教育普遍不满的情况下，这方面的总结尤其具有意义。

上述这些在中华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然后留洋，然后在20世纪50年初回国的海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教育、国防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研制“两弹一星”的关键人物多为其中之人。1999年3月18日，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他们之中，18位是第二潮的归国留学生：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赵九章、陈能宽、钱学森、郭永怀、王大珩、王希

季、黄纬禄、孙家栋、屠守锷、吴自良、杨嘉墀、姚桐斌，还有一位陈芳允曾到英国一个无线电厂的研究室工作过多年。显然，第二潮海归在“两弹一星”功臣中占了绝大多数。

第二潮海归在科学上的成就，在新世纪还闪耀着光芒。例如，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至今，有10人获得该奖，每位得主奖以500万元，其中就有三位就是第二潮的海归：吴文俊（1949年法国博士）、黄昆（1945年美国博士）、叶笃正（1948年美国博士）。吴文俊在拓扑学和数学定理的机器证明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还以将中国传统数学与现代西方数学打通而著名。黄昆在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方面作出了辉煌的成就。叶笃正在气象学上的成果举世瞩目。他们的光芒与前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的光芒交相辉映。

第二潮海归还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而引人注目。他们不仅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其中很多人足以作为国人的道德楷模。他们把科学上的求真与道德上的真诚结合起来。例如，马寅初先生在50年代中期提出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过快的增长，接着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是，他坚持真理而没有屈服，充分显示出真正知识分子的刚直不阿和社会良心。马先生当时写道：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向困难低头……我总希望北大的1.04万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新人口论〉二题》，《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中国人一直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又没有科学头脑的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与传统观念产生冲突，并被“最高指示”定性为“反动的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他面临巨大的压力，最后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但是，他坚持真理，面对权力的压服，他毫无畏惧而坚守他认为是对的“理”，体现了非常可贵的品质。

20年过去后，到1979年，中共中央为马寅初平反。可惜已经晚了，此时中国巨量的人口已成为沉重的负担。80年代曾有一个说法：“错批一人，误增3亿人”。错批的一人是指马先生，误增了3亿指的是从1950年末到1970年初（此时中国政府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出生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如果马先生当年提出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被接受，中国今天就不

会面临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恶劣的环境问题。

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面临铺天盖地的批判而坚决不认“错”，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者，恐怕没有第二人。当时，周恩来从保护他的角度，劝他从大局着眼，写一个检讨。面对这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千方百计营救他的恩人，面对这位令他佩服的国家领导人，他还是拒绝检讨。在将半个世纪过去之后，读着马先生的话：“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周恩来——引者）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马寅初这位老海归的为学与为人，值得新海归及每个有识之士奉为永远的楷模。

第二潮留学生学贯中西的学识和素养，也是令人钦佩的。他们都中西兼通，不仅在西学方面过硬，而且在中学方面也过硬。即使是学物理的人，例如杨振宁先生，他的国学功夫也非常好。他的父亲杨武之也是此潮中的先行者，是一位数学家。杨武之深知中西兼顾的重要性，所以当杨振宁还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的时候，在一个暑假曾专门请人来教他读《孟子》。杨振宁经常说，这件事让他受益终身。他在拿诺贝尔奖的答谢词中也专门提到，他是两种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儿。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也说过，他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产儿。再如，前面说到的、取得第一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数学家吴文俊也是中西兼通的。他在数学研究中独辟蹊径，把中国古老的数

学传统和西方的数学传统打通，从而作出非凡的成就。学理科的第二潮留学生尚且能够学贯中西，此潮中学文科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当我们今天读胡适、冯友兰、林语堂、钱钟书、费孝通等人的著作时，我们会深为他们融汇中西文化的眼光和见解所打动。

在第二波留学潮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插曲：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运动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达到鼎盛，共有数千名中国青年卷入这个运动。与其他典型的第二潮留学生不同，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而试图边打工、边读书，设法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和学业。但是，由于经济压力、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他们中极少有人能够在法国上大学，甚至很多人上中等学校或语言学校都有问题。

同20世纪最初几年有太多的人盲目跟风留日一样，这时也有不少人盲目跟风留法，他们去到法国以后才发现有那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那时已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产生了很多有名的政治人物，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三波：留苏潮

百年留学潮中的第三次潮流是留学前苏联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大陆跟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这意味着：往西方国家留学之路基本

上中断了。当时大陆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很多留学生到苏联去学习，由此产生了第三波留学潮。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只是就中国大陆而言的，台湾、香港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1949年之后，两地仍有很多学生留学欧美，尤其是美国，其中不少人成为各行各业杰出的人才。他们中有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李远哲、崔琦，有第一位美国著名大学华人校长田长霖，还有闻名世界的大导演李安等等。

第三波留学潮跟第一波有相似的地方：留学生集中往一个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不同——彼时的日本是中国的敌国，而此时的苏联则是中国的友邦。所以，两潮中的留学生对留学的感受是不同的：留日学生都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但留苏学生则有很强的荣誉感。顺便指出，在第三潮中，也有个别中国学生前往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留学。不过，这些国家当时均属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因此，这些学生大体上仍属于留苏潮。

第三潮的留学生全部为政府公派生，而无自费留学生。而第一、第二潮中，均有自费生。这是第三潮与前两潮的一个显著不同点。在那时国家财政很不宽裕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慷慨地为这些留学生付费，由此可见国家对留苏向老大哥取经之热心。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对留苏学生说过：“你们一个人的生活费和学费，需要国内17个工农生产的東西供应。”（王政挺：《留学备忘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第三潮的留学生中极少有学文科者，学理科的也不多，学应用科学的人占了大多数，其中又以学工、学农、学医者最多。这与第二潮留学生广泛分布文、史、哲、法、商、理、工、农、医各领域不同。出于此潮的人才，基本上是应用型人才。在这些人才中，有“两弹一星”功臣任新民和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金怡濂、王永志，还有不少“两院”院士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当选的“两院”院士，留苏学生占了比较高的比例。另外，一些前国家领导人也是第三潮中的留学生，例如，李鹏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江泽民曾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

在过去百年留学之四潮中，第三潮持续的时间最短，只有十几年。这当然是跟中苏“蜜月”期之短有关的。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接着有中苏论战，然后双方关系完全破裂。与这种背景相联系，第三次留学潮留苏热在 50 年代末开始降温，至 60 年代中期终结。

第四波：留世界多国潮

1966 ~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独特的十年，也是中国过去百年中几乎完全没有出国留学的十年。在 1970 年初和中期曾送过个别学生出去修读外语和外交，但时间较短，而且不拿学位。其中出色的代表有龙永图、杨洁篪、张亚遂等。这样短期的特殊的海外学习，与典型的留学

有很大的区别。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从噩梦中醒来，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当国门重新打开，国民再次接触外界，有机会踏出国门时，首先引发了积蓄已久的移民潮，继而带出了留学热。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出现了第四次留学潮：留学世界多国潮。这一波超级猛烈的巨潮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今，其汹涌澎湃之势越演越烈。笔者本人即为此潮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之一。

与上一波不同的是，此潮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自费留学生，公费生比例很少。80年代的留学生年龄一般都比较大。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十年浩劫中被剥夺了读书学习的权利，曾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经历过“土插队”之后考上大学，然后再出国去“洋插队”。此时许多人已过而立之年。到90年代，留学生就越来越年轻了，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成为留学的主体。到了上个世纪末，留学年龄有越来越小的趋势，留学热向中小學生蔓延。

第四潮的留学生比以往三潮的总和还要多。虽然至今还缺乏全面、准确的统计，但是，有百万之众的说法并不夸张。目前，从绝对人数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派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北美一些大学的某些专业，甚至存在中国化的现象。例如，在我留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期间（1994-1998年），该校化学工程系的研究生一半以上是华人。在北美，几乎所有的好大学中都有华人，于是有人据此推断：没有中国学生的大学，就不是好大学。

与留学生空前多相应，此潮的留学国也空前多：北美、西欧、东欧各国，还有大洋洲、东南亚、甚至中东等地都有中国留学生。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许多国家是新的留学国，以往从来没有中国学生到过这些国家留学。现在，留学潮甚至已波及非洲和拉美，已有一些中国学生到发展中国家留学。

第四潮还出现了一种前三潮所没有的新现象：少年留学。伴随着这种现象，出现了“小留学生”一词，它往往是指到国外读中学甚至小学的少年儿童。在留日潮中，虽然有很多人出去读中等学校，但是，这些人一般不是少年，而是青年了。大量十几岁或者更小的学生出去留学，是最近十年才有的事。与一百多年前政府公派而最后必需回国的留美幼童不同，现在的小留学生很多背负家长移民的重托。现在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尽早出去学习，以便更易于升读国外大学，更快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成为留学国公民。

笔者的基本倾向是：不鼓励少年留学。除非有父母陪读，或是有亲戚照看，又或者让孩子进入特别昂贵的贵族学校。因为成年人留学尚且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如果让那些未成年人独自去留洋，巨大的孤独感、语言压力、学业压力、心理压力、经济压力等会使他们喘不了气，甚至把他们压扁。由于远离父母亲友，各种压力得不到排解，他们容易出现偏差，容易变坏。“留学垃圾”的产生，就与低龄留学密切相关。正如传媒所报道的，在“留学垃圾”中，几乎都是小留学生。他们在异国打架、吸毒、偷窃、抢

劫、杀人等等，走上了犯罪的路，影响极坏。

在前三次留学潮中，几乎没有不归的留学生。但是，在第四潮中，不归者却很多，有许多人根本就是奔着移民他国去留学，也可以说是借留学的名义行出国之实。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的新现象。不过，最近十年，归来的人越来越多。正如本书开头所说的，“海归”一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大量留学生回国，是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也是他们反复比较，权衡而选择的结果。